

【百本好书送你读】

母亲节之际,当我们回溯那些被岁月温柔包裹的斑斓时,迟子建在《好时光悄悄溜走》中的文字恰如一场无声的告白。她以细腻的笔触捕捉北国风物中潜藏的温情,那些关于炊烟、霜雪与故人的记忆,总与母亲的身影重叠——春雪中送的平、受伤时张开的怀抱、灯下的絮语、离别时欲言又止的凝望。这个母亲节,让我们借迟子建的文字重返记忆的原野,拾取那些被忽略的瞬间吧。

——编者

时光流逝,但故乡永不消逝

——读《好时光悄悄溜走》有感

■姚伟民

40年太短,它是一个人的半生;40年太长,它囊括了无数的回忆。

于是,迟子建在自己最新修订散文集的自序里这样说道:“忘了是四季中的哪个日子,青春的我写下《好时光悄悄溜走》,已然感觉时光如流,美好难再。而一旦岁月的波痕让心起了褶皱,心语就多了沧桑。所以到了六十岁,编辑这本散文随笔集,在书名的选择上,我和出版社的编辑,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这一篇。仿佛它是岁月之河的网,一旦撒下,昨日就会斑斓重现。”

正如迟子建所说的,我们在这本书中,看到了她“昨日”的斑斓。这本起名为《好时光悄悄溜走》的散文随笔集分了4辑,第1辑是记叙,侧重写故乡,写亲人;第2辑是游记,侧重写名胜,写感想;第3辑是艺术观,侧重写艺术家,写艺术作品;第4辑是传记与日记,为家人写传记,为自己的生活写日记。

这本跨越40年的散文随笔集让我想起了迟子建的写作生涯。1964年出生的迟子建,从1983年开始写作,到而今,已经写了超过40年。

这40多年的时光里,我们目睹了作家太多的好作品,尤其是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《伪满洲国》等,这些充满东北特色的文学作品,让我们了解到近一百年来东

北的变迁。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是鄂温克族的百年孤独,《伪满洲国》是东北沦陷后普通人生活的还原。

与之相比,《好时光悄悄溜走》则抛弃了这种书写历史的宏大叙事,致力于书写生活的细节,书写人生的感受,书写对艺术的品位,甚至日记里的碎碎念。

这本看起来更加个人化的书,实际上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加真实的迟子建。如果说作家写小说的时候是身居幕后,不露声色,那么写散文的时候,多多少少会在文章里展现自己的模样。

比如,散文里的迟子建,是我们在《会唱歌的炉子》里看到的小馋猫,是《好时光悄悄溜走》里父亲宠溺的“二小姐”,是《最苍凉的海岸》里,回想起二战战死士兵时感伤的抒情者,是《爱荷华日记》里清醒地意识到“我们的艺术,要真正抵达人类心灵世界深处,写出大哀愁,还有漫长的路要走”的成熟作家……

通过这本散文随笔集,我们看到了一个多样的迟子建。在这个多样的迟子建里,我更聚焦于她回忆故乡与亲人时的模样。人生可能走过很多地方,但故乡只有一个。正如麦家在《尘埃落定》中写到的那样:“故乡就像胎记,是不会消失的。”

而迟子建的故乡也没有消失,它活在迟子建的记忆里,也活在迟子建的文字里。在《我的世界里》中,迟子建写道:“几天前的一个夜晚,我做了一个

有关大雪的梦。我独自来到了一个白雪纷飞的地方,到处是房屋,但道路上一个行人也看不见。有的只是空中漫卷的雪花。雪花拍打着我的脸,那么的凉爽,那么的滋润,那么的亲切。”

滋润亲切的是雪本身吗?当然不是,真正滋润亲切的,是迟子建少女时故乡山峦的“银袍”,是苍茫中的端庄,宁静中的圣洁,是一个纯粹的女子,在纯粹的年纪看万物时的纯粹。

当然,没有一个人能只活在自然景物的纯粹里。想要更好地感受世界,总是不能离开感情。这种少女的感情来自父亲母亲,也来自兄弟姐妹。它是父亲叫她起床吃饭时的急迫,也是和母亲一起看《困难的婚事》时对电影还原生活的感叹,更是和姐弟一起捏柴火时烤洋芋的快乐,那时候觉得火都是会唱歌的……

故乡,只有在离开故乡时才呈现出它的所有意义。迟子建从漠河走到哈尔滨,其实还没有离开黑龙江,但这种绵长的思念就已经在她的心中流淌。从发展的角度看,她的回忆仿佛是一种史料,能够还原一种过去的老生活。这种老生活是撕日历,是捅马蜂窝,是农村的土狗,是沉重的爬犁,是父亲的肖像泛黄,是一切事物的尽头变成沧桑……对于许多城市里的年轻人而言,这些经历似乎已经离自己的生活相去甚远,但不会有一天,当人们厌倦了钢筋森林时,再去

看这些文字,也会和迟子建一样感叹好时光已悄悄溜走。

从感情的角度看,她的回忆里藏着人类最纯真美好的感情。正如《从前慢》写的那样:“从前的日色变得慢/车,马,邮件都慢/一生只够爱一个人。”而迟子建就是从这种慢生活里过来的人。少女时,迟子建是纯真的,她享受大兴安岭绿色的植物,享受北极村飞扬跋扈的大雪,享受在山中拾柴的日子;成年后,迟子建是深情的,她践行了一生只够爱一个人的誓言,尽管和丈夫结婚四年就阴阳两隔,到而今,她依然沉浸于这段感情里。

最深的感情莫过于一生的怀念,最大的敌人莫过于遗忘。就像迟子建在《遗忘》中写到的,她已经记不起12年前读大学时写的日记中,那个刻骨铭心的事件究竟是什么。人生中的有些片段,当时看起来那样重要,但再回首时,却只变成了一抹淡影。

也许,很多当时认为刻骨铭心的事并不怎么刻骨铭心,但故乡和故乡的人和事,却会浓缩成记忆精华,一辈子在我们的心里翻江倒海。

那一片冰天雪地,那一片白山黑水,那一片青春年少,都在文字中活过来了,这不禁让我感叹:好时光真的就这么悄悄溜走了!所以,人生的主题是珍惜,在好时光里留下好记忆,让好记忆成为生命的好篇章。

何须仰望,你便是星空

浅谈报告文学《师范生》的时代价值

■程华

2023年1月,《山西文学》刊发重庆作家李燕燕的中篇非虚构作品《师范生》,讲述了一群师范生的故事。这篇2万多字的作品迅即引发了广泛关注。面对众多读者的热烈回应,同为师范生(1998级)的李燕燕决定:再次深挖下去。

重庆、四川、贵州、江苏、安徽、北京、上海……在大量访谈、查考、深耕后,今年2月,17万余字长篇报告文学《师范生》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。

《师范生》,是对中国40年师范教育沿革历程的全景式扫描。

从计划经济时期到改革开放年代,再到当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,教育体制、机制的变迁,正是国家政治、经济发展的深刻反映,也注定会有无数个体的命运起伏。作者依据翔实的史料、文献,以宏阔的视野、精准的笔触,对中国40年师范教育的沿革历程作了一次全景式扫描。

师范生,指大中专院校师范类专业学生和毕业生,其就业目标即到各级各类学校或教育机构从事教学及管理工作。其中,中等师范学校(简称中师),堪称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重彩之笔,也是《师范生》描写的重要内容:改革开放初期,为彻底改变农村基础教育薄弱、小学师资短缺的问题,教育部《关于办好中等师范教育的意见》出台后,全国中等师范教育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。数年前,国家专门从初中毕业生中招收中等师范生(简称中师生),毕业后统一分配到城乡小学任教。从1982年到2002年间,全国有400多万优秀中师生下沉到农村,成为国家基础教育的坚固基石。

上世纪90年代末,随着教育部关于师范院校由原中等师范、师范专科、师范学院三级体系向师范专科、师范学院二级体系过渡的结构性调整,中师教育悄然落幕,高等师范教育迅猛发展。

与经济政策并行的是教育政策的不断变化。从普通高校招生实行“并轨”制,到1997年后中师生、师范专科、本科生毕业后不包分配;从1999年中师退出历史舞台,到2000年前后全国一百多万民办教师完成转公;从2015年教师资格证全国统考,到2019年前后“师范热”再度出现……《师范生》全面回顾了40多年来我国师范教育的兴衰、高等师范教育的发展,并以此为脉络,凸显了师范生群体的人生轨迹,展示了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深刻、多元之变。

《师范生》,是对时代大潮中平凡守望者影像的深度聚焦。

作品以扎实的采访、生动的笔触,诠释了时代风云与生命个体的密切关联,刻画了为国家教育事业默默奉献的师范生群体:杨大萍、刘丽荣、毛世伟、王哲兰……受访者数十名,涉及人物上百人。

作者将人物置于时代框架中,交叉叙述、平行推进,真实还原其生命肌理、心理图谱、成长变迁。从计划经济年代到改革开放初期,“跳出农门”是无数寒窗苦读的梦想。而一旦考上中师,就能从城市户口、纳入国家干部编制,从而实现人生逆袭。于是,考上中师的刘丽荣得到了全村最热烈的祝贺。

极其激烈的竞争,造就了最优质的中师生生源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许多自小饱尝生活艰辛的初中生,为响应国家号召也为减轻家庭负担,怀揣梦想、扎根乡镇,成为我国基础教育尤其是广大乡村基础教育的中坚力量。

此后数年里,他们或凭着努力走向更广阔的天地,如,因教学成绩突出被引进到重点小学的王世心、杨大萍;或婉拒了更好发展机会,扎根山野成为孩子们心中一盏灯的刘丽荣……无论在什么教学岗位,他们都无怨无悔地为教育事业贡献着全部智慧与心血。

《师范生》,是用理性的观察、温情的笔触,呈现教育工作者的困顿与坚守、艰难与付出。他们如夜空中的星,用微光照亮学子的心灵与人生路。刘丽荣离家时,含泪吃下妈妈煮的那碗荷包蛋;为给双生子筹钱治病而忍痛辍学下海,在欢送宴上大喊“我们根子不会变,我们永远是光荣的中师生”的镇小学副校长;双鬓斑白的同学们携家人赶回将拆的中师,只为与自己的青春记忆作最后的诀别……是他们打动了,但又不是。

诚然,随着经济高速发展、价值观念多元化、教育体制机制迭代转型,师范生已褪去了计划经济年代的光环,但在生活与职场的双重压力下,大多数人仍选择坚守与负重前行。真正打动了,是这个群体的精神世界。跳出“农门”后,以刘丽荣、毛世伟等为代表的中师生,格外珍惜来之不易的“铁饭碗”,也将心比心地关爱着与当年的他们一样的贫苦学生。

传承师者的品德精髓,他们长成了当年恩师的模样。当刘丽荣劝说不要让孩子读书的农村父母而声泪俱下的时候;当面对外国教育专家“你不去大城市吗”的询问,乡村教师王哲兰用流利的英语答:“我就在这里”的时候;当4年前小学教师王红旭为抢救落水儿童跃入激流中的时候……他们实现了从“小我”到“大我”的蝶变,由小爱到大爱的跃升。

学高为师,德高为范。这既是全社会对师者的期望,也当是为师者之主责。

师者如光,虽微致远。教育的终极意义,是让每个生命找到自己的光,发出自己的光,并一起照亮世界。立德树人的师者,是中华文明与文化的传播者。无数的他们汇成头顶星空,照亮了民族前行之路。

主流媒体 系统性变革的探索与展望

——《融媒发展十年洞见》读后

找到平衡点?

同时,本书对“媒体融合”的论述,跳出了“技术决定论”的窠臼,构建了“四梁八柱”框架:认知重构上从“内容为王”转向“用户为本”,强调“服务用户”与“引导用户”并重;战略升级上提出“互联网+跨界”融合思路,如书中2024年“十大突破”中,媒体需嵌入社会治理、参与数据要素市场;平台定位上打造“中国式现代化治国理政新平台”,整合新闻与政务服务;生产关系适配上推动“身份管理”向“岗位管理”转型,建立绩效薪酬与容错机制,破解“大锅饭”困局。书中指出传统媒体的“编委会—采编部门”科层制,与互联网时代的“产品经理—项目制”存在根本冲突;主流媒体需从“内容供应商”转向“传播基础设施运营商”;主流媒体的价值评估应从“发行量收视率”转向“社会治理参与度”。

《融媒发展十年洞见》的价值,不仅在于记录历史,更在于以“系统性变革”为锚点,为未来十年指明方向。作为从业者,我们需清醒地认识到:系统性变革不是选择题,而是关乎存亡的必答题。“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是一种非渐进式变革,是由媒介技术革命性突破、生产传播要素创新性配置、传播方式颠覆性改变而催生主流媒体根本转型的发展手段,融合发展是量变式的持续性动作,系统性变革是质变式的累积性结果,量变不因质变而停止,系统性变革后的主流媒体仍将在新的层级继续融合发展。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以生产机制、传播矩阵、技术赋能、评价体系、运营模式、人才发展为基本内涵,对这些相互关联要素进行全方位、深层次的调整与优化,实现主流媒体系统运行逻辑和最终目标的重塑。”我们唯有以“刀刃向内”的勇气,打破路径依赖,方能在算法洪流中重建主流媒体影响力。该书最珍贵的价值,在于其既忠实记录了中国媒体融合的集体探索,又以2025年“系统性变革”的论述,为未来绘制了理论蓝图。它提醒我们:真正的融合不是技术的修修补补,而是一场涉及制度、文化、人性的全方位革命。这本书,正是这场变革的路线图与启示录。主流媒体唯有以系统性变革重建“专业主义护城河”,方能真正履行“社会皮层”的使命。这或许正是该书留给历史的最深沉回响。媒体融合没有终点,它一直在路上。

■张名章

作为一部横跨十年的媒体融合全景式著作,《融媒发展十年洞见》(刘建华著,人民日报出版社2024年4月版)以年度为经纬系统梳理了2013至2025年中国媒体融合的发展轨迹,用编年体形式记录了中国传媒业从“物理相加”到“化学相融”的艰难探索,为行业提供了难得的全景式观察与前瞻性思考。作为一位一直关注媒体转型与发展的大学教师,当我拿到这本厚重的著作时,内心涌起一种强烈的共鸣。书中对“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”的论述,既是我国媒体十年融合经验的总结,更是主流媒体未来转型的号角。

《融媒发展十年洞见》以清晰的脉络呈现了中国媒体融合的三个阶段:第一个阶段是技术驱动期(2013—2016);第二个阶段是制度调适期(2017—2020);2017年“党的新闻舆论理论创新”标志着顶层设计的成型,2019年县级融媒体中心案例研究则凸显“国家主导+基层创新”的中国路径。但此阶段改革仍受制于“事业单位思维”,如书中2020年章节指出,多数媒体仍幻想“以传统媒体融合互联网”,而非彻底转型为智能媒体。第三个阶段是系统变革期(2021—2025):2021年“机制性问题与机制性突破”直指体制痼疾,2025年压轴章节提出“生产关系重构”,主张通过“组织再造、流程重生、价值重塑”实现根本变革。这一阶段的核心命题是:如何在国有属性与市场化需求间

换个角度 看清朝中西文化交流

——《康熙的红票》读后

似不起眼的“小人物”,亦能在历史的进程中掀起波澜。

书中以传教士为切入点,打破了传统上以西方为主导的叙述方式,由中国视角出发,分析这一群体在东西方交流中的“隐性作用”。在清朝的统治体系中,传教士不仅是文化传播者,也是在皇权与西方世界之间斡旋的桥梁。他们帮助康熙研究天文学、医学,甚至还有物理和微积分,甚至成为皇家的私人教师,而康熙本人也因其对西学的兴趣,让西方知识在宫廷内得以传播。

历史具有偶然性。康熙时代,人们会以为这种文化交流能够持续下去,但历史并非必然性。雍正即位后,他对传教士的态度骤然冷淡,甚至颁布禁令,大幅削弱了传教士的影响力。本书的最大亮点在于,它告诉我们微观个体对全球化发展的影响,它挑战了“历史具有必然规律”的传统叙述方式。康熙时期的文化交流并非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,而是由少数关键人物的态度和抉择所决定。历史在一个人的个人选择中充满着不可预料的偶然:康熙对西学的兴趣,使传教士得以立足,而雍正的冷漠,则迅速终结了这一交流。如果雍正像康熙那样接纳西方的科学与文化,那么中国的近代化进程是否会提前?这正是本书留给读者的一些思考。

以全球史视野,透过西方之眼,这段历史依然充满传奇。《康熙的红票》以严谨的史料考证和生动的叙述方式,重新审视了清朝初期的全球化进程,带来一种耳目一新的解读方式。(作者为太原师范学院学生)



■侯志丽

在2019年北京春季艺术品拍卖会上,出现了一张康熙皇帝1716年发去欧洲的谕令,内容是寻找他派去罗马多年而杳无音讯的洋差。这份谕令呈朱红色,历史上又称“红票”。因正史中没有记载,红票的来历一直成谜。康熙为何会派西洋传教士做差?派他们到欧洲去所为何事?学者孙立天的新书《康熙的红票:全球化中的清朝》从康熙发往欧洲的一张红票(谕令)切入,梳理了顺治、康熙、雍正、乾隆四朝与耶稣会传教士的互动关系,由此来重新审视和解读当时全球化格局中的中国社会。

该书在4月揭晓的第13届春风悦读榜中获年度新知作品,亦是“百本好书送你读”活动的推荐书目。学者孙立天以康熙发往欧洲的一张谕令出发,打捞传教士在清朝的活动和影响,展现了中西文化交往中少为人知的一面,突破了“闭关锁国”的刻板印象。

全球化的浪潮往往被宏观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框架所定义,但历史真的只能由“大人物”和“大事件”推动吗?《康熙的红票》提供了一种不同的视角:微观个体的抉择,尤其是那些看



近悦近来书香重庆

书评投稿邮箱:qrqdsb@163.com



电子书有声书
扫码即可
阅读、收听